

高明学术论集



高明学术论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明学术论集 / 高明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325-7064-5

I. ①古… II. ①高… III. ①古文献学—中国—文集
②汉字—古文字学—文集③考古学—中国—文集 IV.
①G256.1-53②H121-53③K8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1935 号

高明学术论集

高明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43.5 插页 5 字数 824,000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

ISBN 978-7-5325-7064-5

H·106 定价: 16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1989年，高明先生摄于法国巴黎郊外

高明，字诚之，1926年出生于天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著有《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古文字类编》、《古陶文汇编》、《古陶文字徵》、《帛书〈老子〉校注》、《战国陶铭》、《中国历代王朝兴亡四字歌》等。先后在国家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以及为其他学者著作撰写的序言、评论等总计六十余篇。

自序

这本选集是我从五十年代陆续发表的学术论文中选出的五十篇文章，前后约有六十年。其实，时间虽有六十年，其中绝大部分作品是在“文革”以后所撰写的，“文革”前的三十年，仅发表了两篇文章，其一即本书所收《建国以来商周青铜器的发现及研究》，这是《文物》月刊编辑部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向我征文，让我写有关商周青铜器的文章。另一篇《略论汲县山彪镇一号墓的年代》，发表在1962年《考古》月刊第4期，其他论著皆为“文革”以后所撰写，即后三十年的作品。“文革”前频繁的政治运动，很少有人敢于发表学术论著，唯恐被扣上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严重的白专帽子。确有些同志因发表论著招来麻烦，甚至丧了性命。“四人帮”倒台之后，国家政策发生了变化，提出改革开放，学校领导也为师生提供了一个比较安静的教学环境，号召大家进行学术研究，发表论著，培养研究生。这时我的青春年华已经不再，精力充沛的大好时光均已浪费在政治运动与劳动改造之间。万幸的是，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既不是斗争对象，也非可用的主力，属于边缘人物，即所谓的“逍遥派”，因此我还能在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中偷闲，在家里看点书，积累些我所需要的资料。所以在“文革”结束之后，写了一些文章，出版了几本专著。本书所选的文章，多为这一时期撰写的，其中包括中国古文献、古文字与考古学三个方面的论著，承蒙上海古籍出版社不弃鄙陋，主动为我刊印这本论集，甚感谢意。

长时期的政治运动，使我增长了许多见识，能够识别一些人的真假面具。和地位与知识的高低无关，有人为追求权力用尽招数，谄势凌弱，损人利己，结果都未得到好的下场，不仅可悲，而且很惨。从而使我悟出一个道理，做人应以诚为本，不逞强，不凌弱，不图私利陷害人，不为落马人设陷阱，不做无是无非的伪君子。亲诚者，远虚伪，我始终坚持，诚者应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目 录

自序	1
----------	---

文物考古研究

建国以来商周青铜器的发现及研究	3
略论汲县山彪镇一号墓的年代	17
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	24
周代用鼎制度研究	87
谈古越阁藏吴王夫差剑	142
盨、簠考辨	145
陕西华县柳子镇考古发掘简报	153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

从甲骨文中所见王与帝的实质看商代社会	165
武丁时代“贞  卜辞”之再研究	172
略论周原甲骨文的族属	183
论商周时代的臣和小臣	197
从金文资料谈西周商业	208
西周金文“  ”字资料整理和研究	218
说“罍”及其相关问题	229
论《墙盘》铭文中的微氏家族	236
从出土简帛经书谈汉代的经今古文学	247
据武威汉简谈郑注《仪礼》今古文	260

《老子道德经》古注偶识	276
帛书《老子》甲乙本与今本《老子》勘校札记	283
如何勘校出土古籍——谈帛书《老子》	300
读郭店《老子》	309
秦简日书“建除”与彝文日书“建除”比较研究	312
略谈古代陶器符号、陶器图像和陶器文字	328
商代陶文	343
从临淄陶文看衡里制陶业	354
战国陶文	368
侯马载书盟主考	378
论石鼓文年代	386
十鼓斋后人安诗临宋拓石鼓文	397
楚缙书研究	410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冠人”俑	435

汉字漫谈

汉字研究的历史传承	441
“图形文字”即汉字古体说	467
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	476
古文字的形旁及其形体演变	493
略论汉字形体演变的一般规律	558
谈汉字中的别体和误体	572
古体汉字义近形旁通用例	579
汉字的储存与使用	611

今古字音对照表

序论	619
凡例	620
索引	621

对照表	624
-----------	-----

书序及其他

《秦汉石刻题跋辑录》序	665
《商周图形文字编》序	667
《商代地理概论》序	668
唐立庵先生与中国古文字学	671
治学导师 做人楷模——忆张苑峰先生	678
我和中国古文字与考古学	681

文物考古研究

建国以来商周青铜器的发现及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规模宏伟的经济建设的开展,考古事业也得到很大发展,提供出大批的重要资料,丰富了古史的研究。这里仅将解放后发现的重要青铜器及研究成果,分为商代、西周、春秋、战国四个阶段,综述如下:

一、商代青铜器的重要发现及研究成果

解放后的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不仅总结了前人的工作,并解决了很多有关中国青铜时代的重大问题,本节分三个问题来叙述:

1. 商代的青铜工具

商代的青铜工业已非常发达,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商代的青铜工具却发现得很少,过去有人因见商代使用大量石制工具,认为商代是金石并用时代;也有人推断“当时根本没有用过青铜农具”^[1]。这些误解,均为近年的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所否定。郭沫若先生指出:“殷代已经是青铜时代,并不是所谓金石并用时代。”^[2]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出土了一件商代铜铲,该铲“上部的长釜截面作方形,刃部有因使用而卷起的痕迹,由器形和使用的痕迹来看,当是生产工具”^[3]。再如,从最早的空首铲布观察,与大司空村铜铲形制相似,郭宝钧先生曾讲:“早期货币形制采用铲的形状,不便于携带,其所以如此,与古代普遍使用的生产工具作为一般等价物进行交换,是分不开的。”^[4]根据出土的实物与一些专家的研究,证明我国青铜时代的发展,并非先由礼乐器开始,而应当是先从生产工具开始的。

2. 商代前期与后期的铜器

近年来郑州洛达庙^[5]、二里岗^[6]早期商代遗址的发掘,证明安阳殷墟出土物属于商代的后期。1950年至1951年间,曾于辉县琉璃阁商代墓葬中发现一批铜器,其中有鬲、斝、爵、觚及兵器等。“容器具有较显著的特征,容器中如鬲、斝、爵、觚等,器胎较薄,纹饰细浅流动,器形也较为特殊”^[7]。过去在北方曾发现与此形制类似的鬲、爵,有人疑为周末遗物^[8]。安志敏先生根据发掘情况认为这批铜器“具有早期性质”^[9]。1955年郑州白家庄第2、3号商代墓出土铜器15件,有些器形与辉县商代容器相同,如爵的形式

“长流短尾，细腰平底，短柱，柱近流根，底带三足”。二式鼎“基本上是鬲的形式，但略有改变，直耳敛口，分裆，下附三个尖锥状实足”。据报告称：墓上的堆积相当于二里岗商代文化的中期，墓室又打破了二里岗商代文化早期的深灰土层，证明墓葬时代早于安阳，而铜器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商代遗物^[10]。1957年湖北黄陂杨家湾出土6件铜器^[11]，其中斝、爵的形状与郑州白家庄、辉县琉璃阁出土的斝、爵相同，时代亦早于小屯，属二里岗中期。这些铜器作风原始，质地较粗，据白家庄地层证明，它们是商代前期的遗物。

商代后期的活动中心，主要在河南安阳一带。1950年春，发掘了安阳武官村大墓，此墓虽经过多次盗掘，所遗铜器还相当丰富，出土有鼎、簋、卣、爵、觚和车马器、兵器等。同时又于洹水南岸的四盘磨、万里渠、五道沟等地商代墓葬中获得不少铜器，且多附以族徽形的文字^[12]。1953年^[13]和1958年^[14]两次在安阳大司空村发掘大批中小型商代墓葬，1954年春^[15]和夏^[16]两次在郑州人民公园发掘商代墓葬，均出土不少铜器，为研究中原地区商代后期文化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近年在山西境内也发现不少商代遗址，出土铜器也相当丰富，如晋南吕梁山区的石楼县，前后出土四批商代铜器，计有烹饪器、酒器、兵器等30余件，地点在县东北的二郎坡^[17]、北部的后兰家沟、县西南的下庄^[18]及吕梁城西的贺家坪^[19]，这些铜器，均与中原地区商代后期的作风相同，可说明当时两个地区的文化关系。

3. 东南地区的青铜工艺

过去我们所了解的殷商活动范围，只限于黄河下游中原地带，自湖北黄陂杨家湾和矿山水库^[20]发现商代前后两期的铜器后，尤其是1957年安徽阜南县朱砦区常庙乡发现商代铜器，便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常庙乡铜器共13件，造型、花纹均较特殊，其中龙虎尊“肩部为三条龙作蜿蜒形状，龙的头角均突出成三个铺首，下部三个虎头突出，在器的腹部张面露齿作食人状”^[21]，与中原的商代铜器作风不同，显示了东南地区的技艺特征。最近故宫博物院收购的三羊尊，以及湖南博物馆藏的四羊尊，其造型、花纹、技术手法均属阜南铜器系统。阜南铜器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在东南一带，与商代共存一种异于中原特征的青铜制造技术，而过去有一些被误认为伪器的异形铜器，即属于这一格调。由其造型、花纹来看，某些地方青铜工艺技术似较中原地区为高。

解放以来，河南、山西、安徽、湖北等地商代重要青铜器的发现，使商代历史的研究工作获得空前的成绩。证明商代已进入青铜时代，并掌握了很高的技术水平；青铜工具领先发展；前期的青铜礼器形制简陋；东南地区铜器具有地方特征。

二、西周青铜器的重要发现及研究成果

解放以来，各地发现的重要西周铜器，不下数百件之多，分布在陕西、河南、山东、山

西、安徽、湖北、江苏、辽宁等地,本节依出土地区,分述如下:

1. 陕西地区

陕西是周发祥之地,近年来于长安、岐山、郿县、耀县等地发现数批铜器,其中如长由盃、驹尊、盞方彝、辅师夔簋等均附有长篇铭文,记载了重要的西周史实。

长由盃为1954年长安普渡村出土,同出有编钟、鼎、鬲、甗、盘、壶、卣、觚、爵及车器等^[22]。其中8件附有铭文,唯长由盃最长,共53字,记有“穆王在下泃居”^[23]。因盃有时代记载,故亦可知同出器群的时代,对研究其他西周遗物,提供了可靠的资料。编钟为三个甬钟,是目前所知西周最早的一组,在这以前,对周初编钟制度并不了解。该墓东侧,1954年也出土过一批铜器,有鼎、簋、尊、爵、鬲8件^[24]。鼎有铭“叔作旅鼎”,爵有铭“取弗”,簋铭已不可辨。鬲的形制较为特殊,与宝鸡斗鸡台早期瓦鬲墓出土的高领袋足陶鬲相似^[25],保存了周族古老的作风。普渡村位于沔水东岸,周京丰镐附近,这两批铜器代表了穆王时代京都的文化。

驹尊与盞方彝为1955年3月郿县李村出土,计驹尊1件,盞彝3件,均有铭文,驹尊92字,盖各12字,三彝同文各107字^[26]。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器属懿王时代,尊铭为有关“马政”的记载^[27],彝铭记有“六自”、“八自”之事,与克鼎“徂正八自”,禹鼎“西六自,殷八自”所言事同,对研究周代军事组织很有用处。关于这批铜器,罗福颐、李学勤、周尊生均有专文论及^[28]。

辅师夔簋为1957年长安发现,全铭103字。据郭沫若先生考证,“辅师夔”与师夔簋之“师夔”为一人,乃厉王时代乐师^[29]。此器形制典雅,花纹朴素,是西周晚期的重要遗物。

太王由豳迁居岐山,著名的毛公鼎即在岐山出土。1953年3月岐山县京当乡农民因开荒偶然发现铜器6件,有鼎彝及兵器等物^[30]。1954年又在青华镇发现铜器。1956年耀县丁家沟也发现一批铜器,有鼎、爵、觚等,爵、觚二器附有铭文,从其形制、花纹来看与岐山出土的铜器基本相同,时代均属周初。

2. 河南地区

河南是周代重要活动区域。1952年洛阳东郊下瑶村第159号西周墓中出土一件铜铲,形状与安阳大司空村出土商代铜铲相似而较小,可能也是农业生产工具^[31]。1955年中州路第876号西周墓中出土鼎、盃、簋等一组铜器,盃的形制与长由盃相似,时代大致相近^[32]。最近又于东郊发现一西周墓,出土铜器有鼎、甗、簋、尊、爵、觶、觚等,甗、尊等器并附有铭文^[33]。

上蔡是武王母弟叔度的封邑,周初乃“三监”之一。1956年3月上蔡城北田庄发现一批铜器,计鼎、簋、甗、卣等9件,甗、卣等均附有铭文^[34]。这批铜器的形制、花纹及铭

文均为周初作风,或可为蔡国早期历史提供一些线索。

陕县上村岭虢国墓获得大批周代铜器^[35]。其中有些属于西周晚期遗物,如郭沫若先生指出“虢季氏子段鬲”与“虢文公鼎”之“子段”同为一人,乃宣王时遗物^[36]。虢国墓中有一批代表西周末期作风的青铜器资料,它的质地、花纹均较粗,是青铜工业中衰阶段的典型器物。

3. 山西地区

1953年山西洪赵坊堆村一座西周墓中出土完整的铜鼎、簋、甗等8件,鼎、甗腹部留有明显的烟熏痕迹,均为实用之物。分裆鼎并附有铭文,从其形制、花纹及铭文来看,这批铜器乃周初遗物^[37]。永凝东堡于1953年与1957年两次发现大批西周铜器,其中有生产工具、食用器、兵器、车器等,总计达400余件^[38]。晋东南长子县1958年也发现周初鼎、簋各一件^[39]。洪赵、长子周初均属晋国封地,这些铜器对研究晋国早期历史,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4. 江苏地区

1956年6月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西周铜器,是西周考古的重大收获,先出土鼎、鬲、簋、大盘、小盘、盃、牺觥、角状器等12件^[40]。后来又在原坑西北侧发现两个附葬坑,出土小鼎4个^[41]。其中最重要者是“宜侯矢簋”,此器有铭文126字,内17字残泐不辨。据郭沫若先生考证该器属成王时代,铭文“为武王、成王二代伐商并巡省东国时事”,“铭文大可为西周初年井田制与奴隶制之佐证”^[42]。唐兰先生认为乃康王时器,是吴国最早的铜器,并说:“过去有些人曾怀疑吴国不是周的同姓,怀疑周王的势力不能达到吴地等,由于这个簋的发现,使古书上的史料复活了。”^[43]此外陈邦福等^[44],对此器亦有专文论及。这批铜器的造型带有明显地方特征,如矢簋四耳无珥,腹浅圈足高,与当时中原地区的铜簋不类,再如牺觥、角状器等均具江南一带的特色。

5. 辽宁地区

1955年5月辽宁凌源海岛营子村西周铜器的发现,是研究西周时代燕国东北疆域的一批重要材料,如匱侯盃、鱼父癸簋、蔡簋、史伐卣、戈父庚卣等均附有铭文,此外还有鸭形尊、饕餮纹甗、贯耳壶、蝉纹盘、兽首盘等共16件^[45]。唯匱侯盃较为重要,它说明这批铜器的主人是燕国的贵族,盃的造型也与中原作风无别。这批铜器多经修补,器体有焊接痕迹,得知春秋时代的焊接术可溯源至此。在敌伪时期,凌源喀左旗大城子曾出土铜鼎一对,现已不知去向。从凌源出土的铜器来看,西周时代的东北疆域,已发展到辽宁的东部。

除上述地区外,如湖北钟祥^[46]、安徽泊岗、山东黄县^[47]也有西周铜器出土。这些铜器分布在东到辽宁凌源,西到陕西岐山,北到山西洪赵,南到江苏丹徒,横跨八省之地,

说明西周青铜工业分布很广。

三、春秋青铜器的重要发现及研究成果

解放以来春秋时代的考古工作,使我们获得很多新的知识,本节分三个发展阶段,叙述如下:

1. 春秋早期铜器

关于春秋早期铜器,经科学发掘和清理的材料,主要有洛阳中州路春秋早期墓,陕县上村岭虢国墓中的一部分,郑县出土的铜器群。中州路第 2415 号墓出土铜器,有鼎、簋、盘、匜、舟、勺、剑、戈和车马饰^[48]。上村岭以第 1052 号墓出土铜器为代表,其中有编钟、铎、列鼎、鬲、壶、甗、簋、豆、盃、矛、戈、剑、铍、车马饰共 200 余件^[49]。其次如第 1612 号墓出土的双钮铜镜,也属这一时期遗物^[50]。郑县铜器是 1953 年因农民积肥偶然发现,其中有鼎、甗、簋、簠、盘、鬯、方壶、兵器、车器共 190 余件^[51]。这几批早期铜器的共同特点是,质地较劣,造型花纹较粗糙,承袭了西周末期的衰退作风。但此期却有新兴器物出现,如上村岭、中州路出有形制相同的原始铜剑,为战国剑的前身。上村岭的铜镜亦为北方镜始祖。郑县铜器保持了商代的传统作风,如“日火甗”花纹、形制均属春秋,而有商代族徽形文字,再如龙纹盘的花纹布置,也带有商代遗风。

2. 春秋中期铜器

关于春秋中期的铜器,中州路有五个墓,出土有鼎、簋、鬯、簠、盘、匜、舟、车器、兵器等,从簠、鼎、簠等器物观察,与新郑同类器物作风相近。新郑铜器据过去王国维、郭沫若、关百益等人的考证^[52],虽都定为春秋,但具体时间相差 100 多年,迄今仍未得出公认的结论。陈梦家将新郑铜器分作早、中、晚三期^[53]是不正确的。从新郑的某些器物观察,却有些接近蔡侯墓铜器。如双龙钮的方壶、簠、簠、缶,蔡侯墓的莲花瓣簠与新郑的莲壶,以及某些器腹的纹饰等均为同一作风。再如汲县山彪镇早期战国墓出土的华盖立鸟圆腹壶^[54],与新郑立鹤方壶手法极近。新郑也有比较早的器形,如甬柄编钟、虎尊、方甗、鬲、簠等,说明新郑铜器正处于过渡阶段,它既包含了早期文化的内容,也孕育了晚期文化的因素。所以定为春秋中期比较可靠,但是,具体时间绝不能定为公元前 680 年左右^[55],时间提得过早,蔡侯墓的铜器就无法得到解释,定为公元前 6 世纪中叶比较妥当,虽非如王国维所讲“鄢陵之役”的楚器,但时间却在此前后不远。

春秋中期的铜器与早期作风迥然不同,它改变了早期承袭西周末季青铜工业衰退的现象,出现复兴的景象。这一点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关。此时青铜器的制造趋于商品化,不求纯厚而讲究精致、美观,在技术上力求简便,所以出现了分铸与焊接的方

法。花纹也改变了过去单纯雕镂的做法,创造了印版捺印,大大提高了当时的生产效率。这些现象在新郑和洛阳中州路春秋中、晚期铜器上,表现得非常清楚。

3. 春秋晚期铜器

关于春秋晚期的铜器,中州路仅有一墓,出土鼎、豆、鬯、盘、匜、兵器、车器等。最有代表性的为蔡侯墓铜器,蔡侯墓是1955年5月治淮工程中发现的,总计出土铜器480余件,有烹饪器、盛食器、酒器、盥漱器、乐器、兵器、车器、马饰等^[56]。这批铜器有一定的组合关系,如钟、鼎等均配合若干组,不同组的器物有不同的称谓,鼎有三种,特大而唯一的称鬯,即饗,成组的列鼎称为鬯。在花纹方面,采用了异色铜质镶嵌的方法,开战国金银错之先风。从其形制、花纹观察,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但与新郑铜器比较,又以共同性为主。这批铜器附有铭文的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种,即蔡侯盘、谯钟和吴王光鉴。蔡侯盘铭文93字,有“敬配吴王”、“子孙蕃昌”等语,可能是媵器。吴王光鉴,乃吴国铸器,全铭52字,文中有“吴王光”与“叔姬虔敬”之语,据郭沫若先生考证,也是媵器,乃“吴王光之女适蔡侯之孙”^[57]。谯钟铭81字,中有“有虔不惕,辚右楚王”,文献中常见楚伐蔡的记载,此言“辚右楚王”,得知楚蔡的关系和蔡侯的处境。关于蔡侯墓的年代,据郭沫若先生考定,乃声侯之墓,唐兰先生等定为昭侯^[58],按蔡国曾于昭侯二十六年(前493年)迁至今寿县,于齐侯四年(前447年)为楚灭。无论昭侯或声侯,均在5世纪下半叶46年之内,时代比较清楚,为研究春秋晚期的可靠资料。

解放以来大批春秋铜器群的发现,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研究资料,其中洛阳中州路的发掘,对春秋时代铜器的分期,给予很大帮助。今后仍需进一步借助科学发掘的材料,将传世铜器加以整理断代,使其发挥应有的史料作用。

四、战国青铜器的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

解放以来发现的战国重要铜器,据不完全统计,不下千件之多,本节分六个问题叙述:

1. 战国时期的容器和纹饰

战国时代的容器,器类趋于单纯,多为鼎、簋、敦、壶、豆、舟、尊、鬯、盘、匜、鉴等,除鼎有列鼎外,其他多为单出或成对。解放以来发现重要战国铜器的地区,有河南陕县后川^[59],洛阳中州路,辉县琉璃阁、固围村、赵固^[60],信阳长台关^[61],河北邢台西南岗^[62],唐山贾各庄^[63],山东泰安^[64],山西长治^[65],万荣^[66],永济薛家崖^[67],江苏武进淹城^[68],湖南长沙东南郊黄泥坑、子弹库、月亮山、左家公山、廖家湾、麻园岭、识字岭^[69],北郊丝茅冲^[70]等。各地出土的容器,以鼎较为普遍,鼎的形式,虽具有其共同性,但也反映出